

国民革命事典编辑委员会

顾问 韩宁夫 周景堂 邱久钦

主编 曾宪林

副主编 曾成贵 徐凯希

编委 毛磊 田少国 刘继增 任大立 陈乃宣 陈奇文

陈昆满 张光宇 张艳国 郑自来 胡文昌 徐凯希

高世纲 蒋林 曾成贵 曾宪林 谢经华 霍文达

国民革命事典分类主编名单

政党: 陈奇文 石方杰 对外关系(二): 谢经华

政权: 曾成贵 工人运动: 任大立

军事: 张光宇 农民运动: 曾成贵

经济: 徐凯希 青妇运动: 郑自来 徐凯希

思想: 张艳国 典章制度: 毛磊

文化: 蒋林 人物: 陈乃宣

对外关系(一): 刘继增 史迹: 胡文昌 陈登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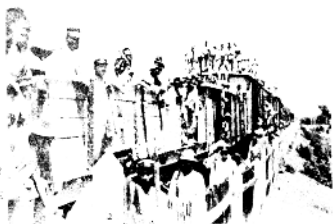
撰稿人:

卜德文	万江红	王梅枝	王怀洲	方学富	甘骏	石方杰
田少国	任大立	任舒泽	刘庆平	刘宏焯	刘继兴	孙泽学
李志远	李海燕	邱一江	吴金池	吴明堂	宋富安	陈乃宣
陈立平	陈奇文	陈国清	陈秋佳	陈登贵	杨菲蓉	杨晓毅
张草	张奇林	张艳国	张俊卿	林铭	易鸿	罗重一
周华	胡湘	胡文昌	胡云秋	赵华斌	赵晓林	梁华平
涂士颢	涂天向	徐凯希	谈方	高世纲	唐丽娟	黄小平
黄长义	黄春华	康凤云	彭浩	彭小海	曾成贵	曾宪林
谢经华	雷正先	雷红梅	霍文达			

提供历史照片单位:

湖北省博物馆 武汉市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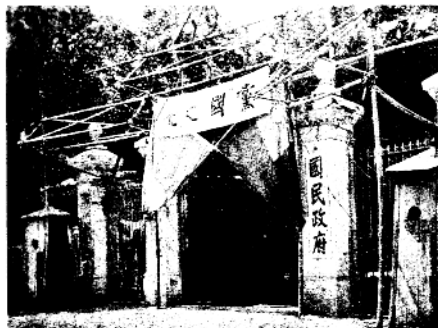
1926年3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后，乘车北上向韶关进发。



1926年9月初，北伐军在攻武昌时，军队下战壕准备攻击。

1926年10月，武汉各界欢迎北伐军的情形。





1927年春，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现武昌造船厂）。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序

曹宪林研究员是我的老学友，他几十年如一日，执着地研究1924年至1927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即国民革命史，或称大革命史，是这个研究领域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卓有成就，著述甚丰。

现在摆在我案头的，是他主编的120万字、1400多个条目的《国民革命事典》一校书稿，这是他和他在武汉与广州的同事们多年劳动的新成果，不付出巨大的努力是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

我约略读了这部著作，感到脉络清晰，条目恰当，内容丰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作者对史料和事实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辨，概括起来有三大特点：一是全，包括了国民革命历史中的14个部类，涉及到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二是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具体的历史问题，都有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和结论；三是新，发前人之所未发，如在经济、思想、文化方面人们是较少研究的。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

曹宪林研究员是一位勤奋多产的史学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60年代初，我从《江汉学报》上即读过他的作品。70年代末，史学界春风解冻，他的学术活动也活跃起来，陆续发表了《论武汉政府性质》、《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迁都之争》、《也谈收回汉口英租界的领导权》等论文。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他的成就我是很佩服的。我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的《中国大革命史论丛》以及合著《中国大革命史论》、《北伐战争史》、《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史》，又相继问世，获得了学界的称赞，特别是王宗华和他及马菊英等共同主编的《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超过了前人的著作，是一部权威之作，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今年是国民革命时期在武汉建都70周年，《事典》恰于此时出版，宪林嘱我为这部书写几句话，在读《事典》的过程中，引发我开启了关于

国民革命史研究方面的思想闸门。

历史研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有一种崇高的目的。《事典》是为纪念建都70年而写的，是为那个伟大的时代而写的，也是为我们的时代而写的，为未来而写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历史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血的教训，是我国历史宝库中的财富。把这段历史用《事典》形式表述出来，这是作者研究的新风格。

5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我曾研究过国民革命历史，60年代前后在《历史教学》上发表过10多篇文章，那时是国民革命史研究的初步阶段，资料不多，我也钻得不深，对重大问题都缺乏阐述和论析，因为其他原因，终止了我对这一课题的探索，然时至今日，对这段历史我仍情有独钟，今见到《事典》就要问世，由衷高兴。记得宪林学友在《我的史学研究道路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后面，都有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见解是值得称赞的。他很注重理论的修养和理论的探讨。当然在《事典》体例中，我们不会看到更多的理论探讨，但终会得到不少理论的启迪。

大革命时期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民族解放史上也树立了好的榜样。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这一时期革命史，在他们的著作和讲话中，总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讲大革命。国外许多汉学家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学者也都着力研究国民革命史，出版了专著，把这时期的中国史放在广阔的时代范围内来评述。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在发展中，《事典》的问世为史学之林增添了新的光彩，希望它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桥梁，以深化这一时期历史问题的探讨，使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永放光芒。

魏宏运

1996年2月写于南开大学北村

前 言

曾宪林

本书按习惯称呼,可以命名为《大革命事典》,但从历史实际和科学性方面考虑,我认为其中“大革命”的称谓最好改为“国民革命”,即把书定名为《国民革命事典》。为说明其中原因,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述论。同时也应对全书的内容、特点,作简要的说明。

《事典》前面之所以要冠之以国民革命,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上1924—1927年的革命,本来就叫做国民革命。但当时从这一历史开始行进时起,直到现在近70年里,其称谓几经变换,然而变来变去,看来还是国民革命这个称呼比较准确。

下面从两个方面,作简要分析:

1. 近七十年来,这段历史的称谓几经变化的简况,及采用国民革命称谓的必要性。

1924—1927年革命称为国民革命,是符合当时的国共两党合作下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动力、目标等实际的,同时也是当时国共两党和国内国际公认的称呼。但是,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当时革命性质和国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国民革命这个称谓自然就失去原有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革命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领导下,在为挽救革命失败而进行艰苦奋斗,以及在革命实现了伟大转折的时候,为弘扬革命正气,把国民革命改为大革命。192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华岗,撰写这段历史的论著时,就把他的书命名为《中国大革命史 1925—1927》。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觉得中国大革命这个称谓不尽科学，也不够确切。1950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新版时，把中国大革命改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80年前后，也有人把这段历史称为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这些当然比大革命要科学一些，但用革命战争也概括不了国民革命的丰富内涵。但当时认识一时又统一不了，于是，就出现了对这段历史有几种称谓的局面：即大革命或第一次大革命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等同时并存，各取所需而用之。一方面大革命的称呼仍然有人在使用，另方面代表组织的比较权威的出版物（包括大专院校的正式教材），把这段历史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如有些论著命名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有些出版物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等。

由于过去几十年来长期在沿用大革命的称谓，大革命这个名称更为深入人心，在群众和干部中很多人以此为习惯用语。所以许多历史学家，在其论著或教材中，大多都用中国大革命或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这个称谓。我和我的许多同行也都是这样，记得1980—1990年，我和马菊英、顾群，在王宗华、郭步云主持下，合作主编和出版全面、系统论述这段历史的学术论著，开始命名为《中国大革命史稿》，后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1991年我和曾成贵、徐凯希合作出版论述这段历史的论文结集，书名也为《中国大革命史论》；从1994年起，我主持编撰这段历史的系列著作，也叫做《中国大革命史丛书》，其中同年11月出版的《丛书》第一部，又命名为《中国大革命史论丛》。当然，在这前后我和谭克绳合作主编论述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专著，也用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这个书名。以上，尽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称谓比较科学，然而用中国大革命名称的人还是多一些。但严格的说，这两者都代替不了国民革命这一称谓的科学内涵。

正是因为这样，这几年来随着这段历史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逐渐有专家、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用国民革命称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开始在论著中使用这一名称。据我所知，近年来在学术著述上，首先用

这一名称作为书名的,是1991年6月,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李新及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由北京大学萧超然等编著的《国民革命的兴起》。其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黄修荣,1992年9月,他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论述这段历史的著作,也用《国民革命史》为书名。

这部书付梓前,李新为其作序,充分肯定了黄修荣这一学术举措,说黄修荣“这是很有胆识的”,他采用国民革命这个概念来涵盖这段历史,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和当时的称谓”,有助于“全面地从多方位多层次来考察这段历史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要求,也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人的党性的表现”。我认为李新的意见和看法是值得重视的,萧超然、黄修荣这个头也带得比较好。我们的这部《事典》,现采用国民革命的称呼,是以积极的态度恢复当时的称谓。

2. 国民革命这一称谓,最先由孙中山提出后有一个质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这就是说,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这一提法的内涵是随着孙中山思想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而不断发展和变化。考察和研究这些发展和变化的国际、国内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具有新的科学内涵;同时也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地了解当时国共两党都同意用这个称呼来涵盖这一时期革命之动因。

翻阅中国近代史册,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舞台上,表演过威武雄壮的活剧,即在振兴中华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在革命生涯中,把自己从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1925年3月逝世前的全部革命斗争,都称之为国民革命。这有他临终前的国事遗嘱为证,他的这一遗嘱一开头就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但他从文字上明确提出国民革命的称谓,是20世纪之初,在他领导成立同盟会前后才开始的。1905年2月4日,孙中山为旧金山致公堂起草《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时写道:“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①明确的提出革命目的。同

年8月20日,他在主持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时,又重提上述4纲16字的奋斗目标。^⑤在这之后,1906年秋冬之间,他与黄兴、章太炎等在日本所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里面,其《军政府宣言》,把中国古代明朝时期的革命和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称之为英雄革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而把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谓之国民革命,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此外,他还对国民在这一革命中的任务、职责作了阐释。他说:“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腥膻,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⑥同时,他又从国民革命的角度,进一步强调国民与军政府责任之一致性,指出:“所谓国民革命者,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有革命之责任,军政府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⑦就是说,靠革命的国民和军政府合作拆军阀政府的台,并以此作为“今后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本”。^⑧

很清楚,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国民和国民革命,其阶级属性和革命性质、任务,都具有当时历史的时代属性和色彩,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国民的主要构成,是要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暴政,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其根本任务。这是以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为背景,以及以民族资产阶级主观力量的壮大状况为基础的,并与孙中山思想从早期的改良到革命的发展分不开的。这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上升时期打着“全民革命”的招牌有类似之处。

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苏联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酝酿等之后,中国革命形势在发展,革命性质、任务在变化,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在改变。在这过程中,孙中山在革命中屡遭挫折,在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于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他从其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清醒了过来,并对工农在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他的思想在发生变化,其三民主义也有质的飞跃而向新的方面升华。这时,国民革命的称谓沿续下来了,他把

国共合作下进行的革命仍称为国民革命,但这时的革命性质,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已经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国民革命。这正如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说的那样,“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详释主义,发布政纲,以宣告全国。”^[40]从这时起,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有了其崭新的含义。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其最低纲领与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的客观情况,也把与国民党酝酿和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进行的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并强调工农在这一革命中的作用。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其中就有一个问题专门谈“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阐述中指出:中国处于现时状况下,革命的“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性质”;在这革命中,“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农民阶级也占有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41]可见,随着国民党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及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付诸实施,国民革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国民的阶级构成也增添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在这个革命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是这样,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等,在作报告、写文章、起草文件时,都常用国民革命这个称谓。

1924—1927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就是具有这种新的内涵的;是国民的阶级构成发生变化情况下进行的革命;是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宗旨的新型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且,这一革命是在当时世界处于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激烈斗争的形势下进行的。对此,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指出:“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下。”^[42]这就非常明确

地告诉我们,这个时期进行的国民革命,其含义之深就在于这一革命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范畴的革命。所以,共产党真诚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进行这一革命。由此,国共两党对革命的称谓就在这种政治基础之上取得了共识,而且在实际中采用国民革命这一称呼。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按照历史的实际把这部《事典》称之为《国民革命事典》。

二

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取得重大胜利,业绩辉煌,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在亚洲民族革命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搞清这一历史时期国内外党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剧烈的斗争,及其兴衰原因,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国民革命结合的情况,总结其经验教训,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这样,它不仅得到国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得到国际中国现代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为纪念即将到来的这一历史时期在武汉建都70周年,我和武汉、广州的部分国民革命史科研和教学人员,共同编撰了这部《国民革命事典》,这对于扩大这段内容丰富的历史的宣传;深化对这一历史的研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将会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编撰这样一部大型的、多功能的《事典》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了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从1993年初起,我和我的70多位同事开始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事典》的编撰任务已经完成了,并且有着与其他辞书不同的内容、特点和功能。

1. 编撰这部《事典》,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反映这段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尽可能溯其史事之由来,究其史事之终结,以及穷其事件和问题之实质和得失。

比如,《事典》较为全面、系统的反映上述国民革命史上的各个方面,除序言、前言外,还有14个部类,即政党、政权、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和妇女运动、对外关系(二个部分)、典章制度、人物、史迹等。合共1400多个条目,全书约122万字。其内容既有国民革命史基础知识的普及,也有对这段历史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和述论;既有对这段历史地位、作用的估量,也有对这段历史重要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国内各政党活动的地位作用,也有国际的,包括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有工人、农民运动,青妇运动,也有军事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演进内容;有革命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府建设,还有典章制度及其实施和重要人物的活动,史迹述介等等。总之,《事典》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和反映这段国民革命历史,介绍和论述了这一革命运动所经历的兴起、发展、高潮,以及从胜利转向失败的全部途程。

如重要问题、重大事件方面。《事典》介绍和述论了这一革命过程中,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列宁主义的主张、斯大林路线的形成和特点,及其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介绍和述论了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政治基础、合作形式。反映和述论了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动的兴起、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北伐战争的进行和胜利、工人运动的发展高潮、农村革命风暴的席卷全国、国民党的分化、共产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出现,以及国共两党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摩擦和斗争,还有五卅运动、省港罢工、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迁都之争、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党权运动高潮、武汉政府的正式成立、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赣州、九江、安庆事件、三·三一惨案、四·一二叛变、四·一五事变、第二次北伐、马日事变、夏斗寅叛变、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七·一五叛变、武汉政府的崩溃变质等。

在深层次的研究和述论方面。《事典》除吸收现有科研成果外,在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对原有问题的介绍和述论上都有新的进展。比如,在上述14个部类的架构上,经济部类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广州政府、武汉

政府,以及各有关省区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是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出现在国民革命的史册上;典章制度作为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撰入《事典》,也是国民革命史过去比较少见的;对外关系问题,过去缺乏系统研究,现在反映在事典上的史实和述论,填补了国民革命史研究的空白。除此之外,其他部类的条目所反映的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比以往有较为显著的提高。

如政权问题上,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得到世界一些被压迫阶级的关注、支持和承认。军事上的条目不仅反映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东征、北伐斗争,及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合作,工农群众对北伐的支援;封建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在军事上的反动活动,还记录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在津浦线上的,性质不同的“北伐”。如政党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条目,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党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领导作用,及其倾向性的错误,反映了幼年时期的特点。国民党的条目,除反映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的重大问题以外,还反映其在南方和北方各省区党部的组织及活动。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条目,不仅反映工人阶级实际斗争,及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同时注意中国工人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联系和相互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注意记述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刘少奇等对工人阶级斗争的理论总结。在农民运动方面,除反映农民运动的实际进程及其特点外,也体现运动的发展规律,体现马克思主义农运思想与中国农运实际的结合。在思潮和文化方面的条目,不仅反映革命和反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摩擦和斗争,及革命思潮、革命文化、教育在为革命斗争服务上的作用,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众多的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为毛泽东思想萌芽中所作的贡献。人物活动的条目,除有国共两党的代表人物以外,还有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分子,以及封建军阀中的头面人物,权衡中外,斟酌古今,反映和体现他们对当时国民革命所取之态度与他们的各种不同的个性。中外关系的条目,则在系统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野心和干涉中国革命方面,超过了以往有关大革命的同类论著外,还从革命政权和反革命政

府两个方面反映其外交活动。史迹条目,虽不全面,但有重点,也比过去大革命史书中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提高。

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事典》极为关注的问题。比如:在政党和其他部类的有关条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及其经验,与后来的分裂及其教训。政权方面的条目,除充分地反映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制定、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经验之外,也有不少条目记述武汉政权最后变质、崩溃的表现和血的教训。军事方面的条目,除展现长驱北上所向披靡的情况和经验,及工农群众与北伐军事胜利的关系以外;也反映国民革命军三打南昌中,前两次得而复失的教训和它与当时革命内部迁都之争的内在关系。在中外关系上的条目,以浓重的笔墨总结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斗争中(包括铁腕外交在内)的经验,及反映了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外交上的教训。在工农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除总结了运动的恢复、兴起、发展、高涨、新阶段等成功的斗争经验以外,也反映了运动中敌对势力干扰破坏运动的情况和原因以及革命内部右的和“左”的错误给运动带来的不良影响和深刻教训。

2.《事典》是一部溶知识性、学术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以客观历史事实为立论基础的,反映时代精神充满时代气息的,具有多功能的大型工具书。

历史是事实的科学,又是带理性的科学,因此,历史研究是以历史资料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的。应该说,没有资料就无从研究,没有理论就谈不上出高质量的史学成果。《事典》要成为国民革命史研究的新成果,当然也不能例外。

上述这些方面,是各有要求而又相互联系的,其根基就是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则是其根本,有了这两条就有知识性、学术性、科学性、可读性。正是因为这样,在编撰《事典》过程中,我们全体编撰人员,都严格按照史家的“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要求,并注意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努力把握史料,研究史料,进行理论思维,并在写作中注意逻辑,注意语法修辞,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我们

十分重视史料、哲理和文采的结合,这样做收到良好的效果,在《事典》的观点、史事叙述、哲理分析、历史结论等方面,有辩证思维的闪光,提高了《事典》的质量。可以说,这部《事典》是我们武汉地区和广州地区70位近现代史工作者多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过去有过这样的名言:“诗人达到最高境界是哲人,哲人达到最高境界是诗人”。这是说,诗人情真,哲人理真,情真需要理真,理真要求情真,情真和理真不可分离,诗人和哲人功底到了一定高度,就很难分开,这是的确的。然而从社会科学的整体上说,总觉得上述这些意思还不够完整,好像缺少相关科学的进一步呼应。积几十年史学工作的经验,及这几年主编这部《事典》的体会,认为这句名言还可以补上一句:这就是,史家达到最高境界则既是哲人又是诗人。因为,地道的史家必然事真,其出手之书定是公正可信,而且史家要达到同样的境界,也是离不开事真、理真和情真。既然如此,那么史家不也就是哲人和诗人吗?所以,史家、哲人、诗人是分不开的。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很不容易,但有志于史学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服务的执着的专家、教授,就非要努力达到这样的境界不可。在《事典》编撰的二三年中,我亲眼看到不少同志,就是在这种高标准的要求下工作和锻炼的,他们在国民革命史的科学之山攀登时,盯住这一领域中的热点和难点,不断的在啃硬骨头,从而使《事典》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下苦功夫从浩繁的史料中理出头绪,探讨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进而反映时代精神。

比如,全书14个部类条目,其基调是什么?这是全书和各部类主编在编撰中碰到的十分严肃的问题。然而经过反复思考,认真琢磨,终于找到了答案:革命。革谁的命?革帝国主义的命,反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反对统治中国的封建主义。诸如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北伐,掀起工农群众运动等,一切的一切都是为把上述敌人推翻掉,都是为了革命。当时赤都武汉上空高高飘扬的旗帜,写上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标记,但认真看来去,其实是革命两个字!因此,我们《事典》的每一个部类,每一个条目都是以此为立论基

基础和架构的支柱。

又比如,历史和现实怎样联系?历史主义的格言是“不了解过去,就不懂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中国国民革命史,从深层次去搞清当时国共两党在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创造的前无古人的辉煌,及其全国和世界革命的意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当时革命精神重要性的认识,加深对当时革命意义的认识,以激励我们和青年一代,继承和发扬亦都武汉的革命传统,在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奋发向上,再造辉煌。此外,还要从具体历史研究中,找出历史真理,作为今天的向导。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什么能成功?到底有什么启示?如果把它弄清楚了,这样历史的研究不就为现实服务了吗?我们《事典》的许多部类和条目,实际上都有这些精神,都不同程度地起到这样的作用。

再比如,时代气息又是如何去体现?去年在我写《中国大革命史从书》前言时,写过这样一句话:“形势的发展,需要把这段历史的研究推向新阶段”。现在我和武汉、广州的同事们,共同编撰《国民革命事典》,同样是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事典》能否体现时代气息?能否保证质量?关键在于是否反映了时代精神。假如我们能从国民革命时期,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的革命思想的研究中,看到它在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历史转变中的历史作用,及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包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的重要性)的启示,找到今天贯彻执行农业是基础的理论根据,找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如果研究北伐战争历史,能加深对于北伐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关系,以及与现在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以增强保卫祖国,保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如果在研究武汉国民政府政权建设上,找到当时国共两党在这个政权上的合作方向、形式,对我们今天“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可借鉴的经验教训等等。这些不就是时代精神,不就是时代的气息!不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事典》编撰工作中所要追求的东西吗!

不管你承不承认,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国民

革命史,或者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革命史。这是因为各个时代的学术研究意识不是相同的。如果说,20年代末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与我们在80年代末的大革命史,在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意识不是完全一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编撰《国民革命事典》与80年代研究大革命史的学术意识也不完全相同。因此,这就告诉我们,现代学术研究,首先要有现代学术意识,才能在国民革命史研究中反映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这样研究的国民革命史,才能在时空上既是过去的又是现在的;在地域上既是中国的,又是东方的,也是世界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撰的《事典》,才会有时代精神和时代气息。这方面,尽管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但我们是按这样的要求在进行工作的。

一九九五年十月于武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注解: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891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891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4页。

③④⑤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891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84—85页。

⑦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页。